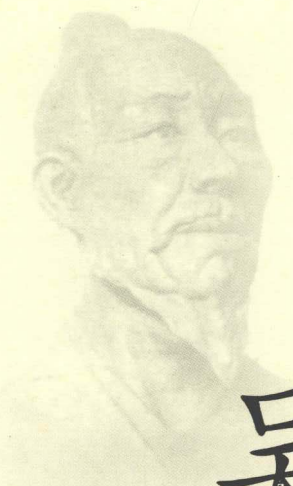


江苏
历代
名人
传记
丛书

总编 宋林飞
副总编 陈刚



魏文哲 著

吴承恩

他出身贫寒，
饱读诗书，
多才多艺，

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他在科举道路上屡受挫折，
郁郁不得志。

他在前人基础上创作《西游记》，
开启明清神怪小说一大流派。

总编 宋林飞
副总编 陈刚

江苏
历代
名人
传记
丛



吴承恩

魏文哲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承恩/魏文哲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2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214-08625-9

I. ①吴… II. ①魏… III. ①吴承恩(约1500~约1582)—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371号

书 名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吴承恩

著 者 魏文哲
出版 统 筹 韩 鑫
责任 编 辑 韩 鑫 石 路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责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1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625-9
定 价 23.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 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 37.5%,如清代文学家 1741 人中有 599 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者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

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

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

宋林飞

2013年5月

序

目 录

第一章 吴承恩所生活的时代	(1)
一、政局演变与经济状况	(1)
二、思想学术与宗教状况	(4)
三、正统文学的衰落和通俗文学的繁盛	(11)
第二章 吴承恩的家世和他的青少年时代	(13)
第三章 吴承恩的壮年和中年时代	(23)
第四章 吴承恩的晚年和身后	(43)
第五章 吴承恩的社会交游	(49)
第六章 吴承恩的诗文创作与思想性格	(60)
一、吴承恩的诗歌	(61)
二、吴承恩的词曲	(84)
三、吴承恩的各体文章	(92)
第七章 多才多艺的吴承恩	(103)
第八章 吴承恩与《西游记》	(112)
一、取经故事的历史演变和《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112)
二、《西游记》的版本和作者	(121)
三、《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124)
四、《西游记》的艺术魅力	(167)
五、《西游记》的流传与影响	(202)

附录一 吴承恩年谱	(208)
附录二 《西游记》研究综述	(232)
参考书目	(247)

第一章 吴承恩所生活的时代

关于吴承恩之具体的生卒年月，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吴承恩生活于十六世纪，约1500年—1582年左右，历经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这个时期已到明朝中后期，这几朝皇帝（除了明穆宗）与明朝多数皇帝一样，昏庸荒淫，不能认真处理政务，宠信宦官和幸臣，致使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在民生方面，一方面是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社会风俗由于受上层社会的影响，而变得奢侈浮华，道德沦丧，民风日下。在思想文化上，程朱理学虽然依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已趋衰微，心学代之兴起，其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影响开始笼罩学术思想界。

一、政局演变与经济状况

公元1506年，明武宗即位，年仅十五岁，年号正德。明武宗在位期间，一味地荒淫嬉游，寻欢作乐，不理朝政。他宠信太监刘瑾等人，任由刘瑾一伙太监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引起朝臣不满。正德五年（1510年），在大学士杨一清、太监张永等人的努力劝说下，明武宗终于将刘瑾集团铲除。但此后明武宗昏庸荒淫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他大兴土木，建宫殿，造豹房，掠夺各地女子供其荒淫取乐；在钱宁、江彬等宠臣的蛊惑、引导下，明武宗频频微服出游玩乐，他逛妓院，抢民女，甚至离开京城，跑到边关宣府、大同一带巡幸，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又自封“太师镇国公”，似乎连皇帝身份也不想要了，可谓荒唐至极！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攻陷南康、九江等地，势甚猖獗。明武宗听到宁王造反的消息后，决定御驾亲征，其目的却

是乘机到南方游玩。但不久之后，在江西任副都御史的大儒王阳明很快将宁王打败擒获，平定了这场叛乱。然而明武宗得到捷报后，竟然封锁消息，秘不外传，依然执意去江西平叛。在路上，明武宗走走停停，游山玩水，直到年底才到达南京。在南京过完新年后，又在那里玩了半年多才离开南京，向北京进发。但在返回途中，他继续沿路游玩，结果在清江浦钓鱼时落水，因此得病，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仅31岁。

明武宗去世后，明世宗即位，年号嘉靖。明世宗即位后，铲除了武宗时期的一些弊政以及邪恶势力，大大地遏止了宦官对朝政的影响力。宦官的势力被打压下去后，内阁的势力得到加强，内阁成为新的权力中枢，尤其是内阁首辅的权力大大提高，俨然成为宰相，但其实最高权力依然属于皇帝。

明世宗是以藩王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为了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他即位不久就试图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身份。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却大加反对，他们死板地恪守传统宗法制度，认为明世宗应当以明孝宗为父，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这当然是明世宗不愿接受的。这就是所谓的“大礼议”事件。围绕这一事件，朝中大臣分为两大阵营，互相攻击。经过十多年的争斗，最终以明世宗大获全胜而告结束。这一事件在明朝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明朝士大夫结成朋党，争权夺利，互相攻讦的不良风气。

明世宗迷信道教，妄图长生不老，所以他长期不理朝政，与道士们混在一起，耗费大量的金钱财物进行斋醮、炼丹。他信任奸臣严嵩，结果严嵩父子长期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致使官场黑暗腐败，民生凋敝，蒙古、倭寇势力猖獗，横行于中国的北方和东南方，冲击着明朝的统治，给当地百姓带来严重灾难。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穆宗即位，年号隆庆。穆宗即位初年，革除了嘉靖时期的许多弊政。在他统治期间，多年骚扰北部边境的蒙古部落主动向大明王朝归顺，大大缓解了北部边防的压力。穆宗为人比较宽厚、节俭，所以政局相对稳定。但他在位的时间很短，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穆宗去世后，明神宗即位，年号万历。万历初期，张居正以内阁首辅主持朝政，厉行改革，使明王朝的统治暂时有所起色。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神宗在位时间很久，达四十八年，但他长期不理朝政，沉溺于荒淫腐朽的生活，任由大臣们争权夺利，腐败堕落，胡作非为，使明王朝的统治重新陷入危机之中，衰颓之势日益加深，于是逐步走向覆灭。正如《明史》上所论断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朝皇帝大多数都是昏庸之辈，只有少数皇帝是例外，如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明穆宗以及明思宗崇祯皇帝；但这些所谓圣明之君也各有其缺点和不足：太祖、成祖残忍滥杀，好大喜功；仁宗、穆宗虽然宽厚仁慈，却都是短命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崇祯皇帝性情浮躁，过于专断，且生于末世，明朝元气已尽，气数已尽，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都是昏君，只有穆宗算是个明君，却又短命，在位仅六年即去世。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的素质和能力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具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明朝有那么多昏君，而明王朝的统治却能够持续近三百年，窃以为其主要原因是明朝有很多忠臣、能臣，是他们支撑并延续了明朝的统治。然而到了明朝后期，皇帝太昏庸、荒淫，吏治太腐败，民众太困苦，再加上天灾流行，于是在内外夹攻（内部农民起义，外部满人的崛起和进攻）下，明王朝终于扛不住了，逐步走向灭亡。

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同时，由于历代以农为主，重视农业和农民，对商人和商品经济是抑制的，从总体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高。因此，古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当然，两极分化的现象很突出，很明显。在每个王朝的中后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往往会通过买卖、兼并而集中到少数官僚地主手里，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生活更加贫困。普通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也深受赋税的束缚和压榨，生活水平也比较低下。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状况与历朝历代和平时期的情况大致相同，并无太大的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很多城镇商品经济比较

发达,尤其是东南地区,其商品经济更为发达,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有力补充,使得中国部分地区,特别是交通便利、人员辐辏的城镇的经济较为繁华,如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天津、扬州、景德镇等地都是当时的经济重镇。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海外贸易。但由于利润丰厚,在利益的驱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极为发达。由于政府厉行海禁政策,很多商人逐步演变为海盗。他们勾结倭寇,屡次大肆掳掠东南沿海地区,给当地百姓和明朝政府带来巨大危害。明朝政府经过多年努力,才将倭寇逐渐铲除。

二、思想学术与宗教状况

明朝开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但由于程朱理学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发展,逐渐成为束缚思想学术的枷锁,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和反思,这促使学术思想界逐步转向南宋大儒陆九渊开创的心学,使心学重新抬头、复兴。成化、弘治年间的学者陈献章提倡心学,成为明代心学的先声。到了正德年间,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创立姚江心学,大力提倡和传播心学,使其学术思想几乎弥漫天下。

王阳明的思想学说主要有三个核心命题:一,心即理。二,知行合一。三,致良知。

在本体论上,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心与理为二”的思想主张,而是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主张,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王阳明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思想主张,建立了自己的“知行合一”理论,他说:“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致良知”是关于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因为良知是

心的本体，所以王阳明认为朱熹“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总之，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可以用他自己的四句话加以概括：“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所谓的“王门四句教”。

王阳明的思想学说是当时渐趋死板、僵化的程朱理学的修正和冲击，具有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嘉靖、隆庆以后，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几乎笼罩了整个思想学术界，甚至有取代程朱理学之势。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死后，王学开始发生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浙中王学、江右王学与泰州学派。

浙中王学的主要代表是钱德洪和王畿。钱德洪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以继承和发扬师学为己任，缺乏创新精神，只是在先师思想学术的基础上做小小修补，所以他的思想学术必然走向保守和停滞。

王畿，号龙溪，浙江山阴人。他是王阳明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为王学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的思想学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深，所以他使王学更加神秘化。

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是邹守益和欧阳德。江右王学的特点也是偏于守成。黄宗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所以江右王学被视为王学正传。他们以卫护师说为己任，因此在思想学术上没有创新发展，这同样使王学必然趋于衰落。

然而在王阳明弟子中也有很多不愿墨守陈规、思想激进的人，他们敢于对王学进行修正、批评，加以发展变化。这些人主要有黄绾、杨慎、罗钦舜、王廷相等，其中尤其以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有较大影响。

王艮是平民出身的学者，所以他否认宋儒所强调的“道”的神圣性，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即是道”。圣人

之道是以百姓日用为标准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凡是脱离了百姓日用的玄谈，“皆谓之异端”。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这种思想显然与“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禁欲主义是互相冲突的。

泰州学派在嘉靖、万历年间得到广泛传播，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比较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学者主要有王栋、王襞、林春、徐樾、赵贞吉、颜钧（山农）、何心隐、罗汝芳以及最具叛逆和异端色彩的李贽等。这些人的思想学术是比较自由活泼的，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反对道学的禁欲主义，大胆怀疑经传的权威，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尤其是李贽的思想更加激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学的藩篱，具有明显的异端色彩。

李贽是福建泉州人，出生于商人世家。他二十六岁时中举，后历任教谕、国子监博士、知府等官职。中年时期他与泰州学派人物有很多交往，并且以王良的儿子王襞为师。他的思想在泰州学派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具有更大的叛逆性。

他敢于怀疑和挑战儒家圣人和儒家经典。他说六经、《论语》、《孟子》等书所记载的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即使是出于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时而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他公开宣称后人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发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见解，认为“道”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已，“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因此，他反对正统道学的禁欲主义，提倡及时享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容许人们自由地追求个性和快乐，“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之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望。”他提倡“童心”即真心，反对道学家的虚伪、做作、扭曲人性。

李贽的叛逆思想在当时即遭到正统派的围攻，他的著作多次

被官府禁止和烧毁，李贽本人也被投入监狱，被迫自杀。然而李贽的思想在当时以及其后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文学上的“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就服膺李贽的思想，深受其影响。著名文学家汤显祖也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李贽的弟子汪本珂曾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者。”（汪本珂《续刻李氏书序》，见《续焚书》卷首）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也说：“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日知录》卷十八）这些说法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李贽的著作后来传到日本，对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吴承恩是个不拘小节，崇尚个性自由，疏狂洒脱的名士，所以他的性格使他很容易接受王学的影响，与王学人物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淮安的龙溪书院读书。龙溪书院既然以著名的王学代表王畿（号龙溪）的名号命名，那么这里必然是宣扬王学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个学习、揣摩八股文以应考的地方，所以吴承恩的思想必然或多或少地会受王学的影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鉴于元朝对喇嘛教的过度尊崇，导致喇嘛教腐败堕落，危害了国家的稳定；又鉴于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经常会策划和领导起义和暴动，同样严重地威胁了朝廷的统治，所以他对宗教的管理和控制相当严格。朱元璋并不信仰佛教或道教，但他尊重佛教和道教的存在，同时又对宗教加以严格限制和管理，以利用宗教加强对黎民百姓的统治。朱元璋对宗教既严加控制又加以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到后来却被他的子孙后代逐步破坏和改变了。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渗透，至少从唐代开始，佛教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对佛教本身有所抑制，但明朝的多数皇帝是崇拜佛教的，即使朱元璋本人对佛教也表示好感，以便利用佛教。这使得佛教在明代依然是香火旺盛，佛教的影响依然非常广泛，尤其是士大夫所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明代中后期盛行一时的王阳明心学就深受佛教思想的浸润和滋养。

朱元璋认为,儒、佛、道三教不可或缺。因此他对三教都比较重视,以期利用三教为明朝的统治服务。他早年曾经做过和尚,所以对佛教有一定感情。成为皇帝后,他经常宣召僧人入宫,讲经说法;他亲自撰写《拔儒僧入仕论》等文章,主张任用所谓“儒僧”。他还下令编纂、刊印大藏经,即洪武本大藏经。明成祖更加支持佛教。他本人曾编辑佛教方面的文献,如《神僧传》《金刚经集注》等;他重新刊印洪武大藏经(即南藏),迁都北京后又编纂《北藏》。成祖尤其崇信喇嘛教,封喇嘛教高僧噶玛巴等人为大法王。成祖在皇宫里还设立了番经厂、汉经厂,让宦官在里面举办法事。此后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武宗、神宗等皇帝均迷信喇嘛教,武宗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在宫中建造佛寺,穿着喇嘛僧的服装,大做法事。明朝皇帝支持佛教,其动机不是出于信仰,而是迷信和利用佛教为朝廷服务而已。

宋元以后,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特别盛行,其他宗派逐渐衰落,或者融入禅宗、净土宗,同时禅宗、净土宗也呈现融合的趋势。万历以后,涌现出一批佛教高僧,使佛教呈现中兴气象;其中的代表就是晚明四大高僧:云栖株宏(号莲池)、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

明朝士大夫普遍亲近佛教,甚至成为在家居士。如明初著名文人宋濂自号无相居士,经常研习佛法,还撰写几十篇与佛教有关的文字,被辑录为《护法录》。明代中期,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创立、宣扬心学前也曾研究佛法,其心学明显受到佛法的影响。其后学也多受佛教的影响和浸润,如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常与僧人交游,深受佛法影响,被人称为狂禅。深受李贽思想影响的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则醉心于净土宗,其中袁宏道撰《西方合论》,是明代净土宗的重要文献。随着王学的流行,士大夫参禅学佛的风气甚为兴盛,从而使居士佛学出现中兴。如瞿汝稷编撰《指月录》三十卷,王肯堂编撰《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焦竑撰写了多部佛经注疏,屠隆撰《佛法金汤录》三卷,庄广编辑《净土资粮全集》六卷。嘉兴大藏经的编纂成功也得到袁黄、陆光祖、冯梦祯、陶望龄等居士的大力帮助。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政策也是既控制又利用，不少皇帝也迷信道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神化自己，公开宣称自己多次得到神人的帮助；为了益寿延年，他还服食金丹；他重用一部分道士，如刘基、张正常等人显贵于时。明成祖通过战争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为了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他大力崇奉北方玄武大帝，宣称自己的皇位是神授的。为此，他在湖北武当山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道观。明成祖之后，仁宗、宣宗、英宗、代宗诸皇帝都是迷信道教的，其中仁宗、宪宗、孝宗均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明世宗即位后，他对道教的尊崇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妄图长生不老，沉溺于炼丹、斋醮等活动，因此长期不理朝政，任由权臣把持朝政，听任朝臣结党营私，互相争斗。他宠信道士，许多道士骤得高官，显要一时，如道士邵元节官至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世宗还为之流泪，风风光光地将他安葬。道士陶仲文因方术屡验而被破格授予少保、少傅、少师、礼部尚书，以一人而兼领三孤，古今罕见！明世宗对反对道教的大臣一概治罪，对支持道教的大臣则多加以重用，如夏言、严嵩、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人以善写青词（向天神祈祷的文书）而成为宰相，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世宗长期服用丹药，最后也中毒而死。世宗不仅极力尊崇道教，同时还严厉打击和削弱佛教势力。明朝皇帝多次命人搜集、整理、刻印《道藏》，如正统年间刻印的《正统道藏》和万历年间增修的《万历续道藏》。

元代以来，道教和佛教一样渐趋衰落，道教各派逐渐融合为正一教、全真教两个教派，前者是符箓派的总汇，后者是丹鼎派的代表。由于全真教在元代与元朝皇室关系密切，所以朱元璋登基后有意疏远全真派，转而扶植和利用正一派，命正一派天师掌管全国道教事务。因此，在明代，全真教逐渐冷落，正一派的地位较为显赫。尽管正统道教已趋于没落，但它的许多思想观念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朝的建立过程中，穆斯林作出了很大贡献。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汤和、邓愈、沐英、蓝玉、冯国胜、冯国用等穆斯林将领